

责任编辑：高 红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钱庄史

陈明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8 字数 1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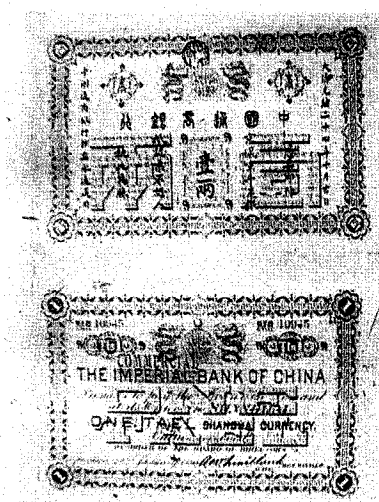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675-1/K·109 定价：13.70元



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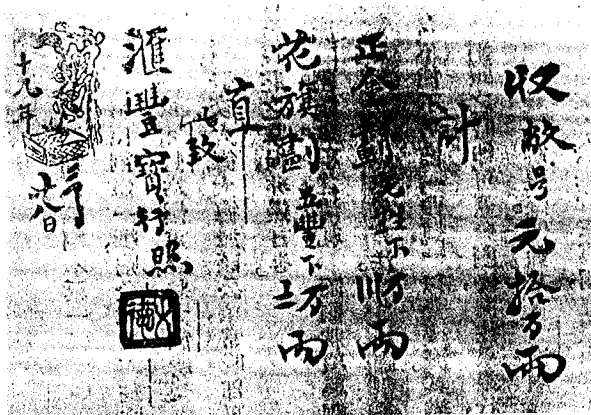


銀票



二七宝

这是从前上海租界内同源银炉所铸的二七宝,又名“夷场新”(从前俗称租界为夷场),为废两改元以前上海通行的标准宝银。



钱庄与“外滩银行”进行清算所用划条

钱庄每天与使用现银收付(钱业术语称为“划头”)的“外滩银行”(主要指帝国主义银行)进行清算,必须开出如上式的划条(亦称横帐),分送当日有进出的各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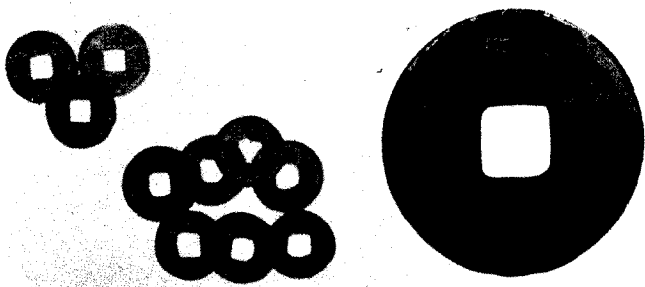
至少在1776年,上海就有钱庄业行会组织,邑庙内园钱业公所匾额所题“博厚悠久”,并非虚语。



当年位于南京东路、北京东路之间大片称为后马路的区域,钱庄最为集中。



庄票 这是上海汇划钱庄之一承裕钱庄(设立于1894年。至1922年因股东更动,加“姓记”两字)开出的庄票,票面金额上画有一大圆圈,是已经付讫缴销作废的符号。



开元通宝钱
采自《中华古文明
大图集·通市》

前 言

货币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剩余产品和交换行为之后而出现的。我国货币起源很早,流衍不断,从夏、商王朝的海贝开始,铜钱、铁钱、金子、银两、纸币各种货币形态或并行,或交替,一直绵延发展至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交流媒介角色。

与此同时,把货币本身当成一种商品进行经营赢利,也是源远流长的经济活动。例如,战国时期的高利贷活动已经相当普遍,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大高利贷者,由此产生了冯谖焚烧债券为他收买人心以作“狡兔三窟”之计的故事。此后,到南北朝、唐代,史籍又出现了有关质库(经营典当)、柜坊(经营货币的保管与代付)等初级的旧式金融机构的活动记载。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种民间金融机构——钱庄,大致萌芽于16世纪下半叶即明朝后期,发展于清代初期,鼎盛于清代后期和民国前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初,伴随着庆贺“公私合营”的锣鼓鞭炮声而汇入了现代银行业,其兴衰历程大约有四百年。

在官私文献中,钱庄业又称钱业,其股东和经理号称钱商。所以1947年10月成立的全国性钱业同行组织就取名为

“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可见钱庄业是一个独立的行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和习俗特征的社会群体。这就是本书拟加以探讨和介绍的对象。

历史事物通常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往往可以获得不同的印象，即如苏东坡咏庐山诗所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钱庄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国的货币发展史如此漫长，作为金融机构的钱庄为何姗姗来迟？它是际会何种历史风云而起，又是如何被历史浪潮席卷而去？它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习俗受何种历史传统的影响，又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民俗打下什么样的印记？它比起同是旧式金融行业的典当业以及新兴的现代银行业有什么行业特色？它在中国经济史和金融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如何评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从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加以探讨和解答。前辈学者于此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了不少有关钱庄的论著，如杨荫溥的《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施伯珩的《钱庄学》、潘子豪的《中国钱庄概要》、区季鸾等的《广州之银业》等，都颇有代表性。特别是30年代出版的一批地方经济情况调查或考察报告，均或多或少地述及钱庄。不过，这一时期的论著都是从金融的经营和管理的角度来谈论钱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了继续有大量的论著从金融史、货币史的角度论及钱庄之外，有两部史著引人注目。一是19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撰的《上海钱庄史料》一书。该书不仅完成了一项钱庄史料整理的基础工作，功德无量，而且表达了编者对上海钱庄史的诸

多观点,颇有新意。编者试图通过编选史料加以说明的问题已不局限于金融运营的范围,而是把上海钱庄史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由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进程中加以观察,认为上海钱庄的起源、发展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其视野显然是此前比较纯粹地从金融史角度研究钱庄史者所不可比拟的。二是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辉的《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一书。该书旨在解答诸如晚清的钱庄和票号的信用活动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在中外经济势力相磨相荡的过程中,钱庄、票号的职能起了怎样的变化?它们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起着服务作用,以及外国金融势力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等问题。这种研究角度是对《上海钱庄史料》编撰角度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触及到近代中国钱庄的本质问题。

由此可见研究钱庄史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并非题无剩义,新篇仍可望色彩纷呈。本书根据编辑要求,应该着重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钱庄这一行业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金融作用、社会影响的演变进行系统和科学的梳理,特别是注重对钱商的职业习惯和道德准则、经营管理的习俗和技术等文化特色进行剖析。为此,本书的写作构架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一章为“钱庄兴起的历史考察”,拟从行业的整体特征出发,而非拘泥于一时一地钱庄的产生过程,去分析钱庄诞生和兴起的历史条件,剖析其各项金融功能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为“钱庄的组织形式和人事关系”,中心在于剖析钱庄在组织过程中编织起来的各种人事关系网和相关的习俗。这是钱庄文化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第三章为“钱庄的票据和帐簿”，从对外票据往来和内部帐簿管理两方面介绍钱庄文化习俗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

第四章为“钱庄的经营要术及其特色”，从经营之道剖析钱庄的行业特色，介绍钱庄文化习俗的又一部分重要内容。

第五章为“钱庄与金融风潮”，意在通过描述钱庄在数次金融风潮中的浮沉之态，说明影响钱庄兴衰的社会经济基础，并述及其内部管理方面的原因。

第六章为“钱庄与政治风云”，除了以典型事例说明政局动荡对钱庄兴衰的具体影响之外，着重说明政治权力在加速钱庄业的衰落并步入历史的结局中的作用。

以往研究钱庄史，实际上多以江浙特别是以上海的钱庄为重点，倘旁及他处，也往往语焉不详。原因在于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其钱业是中国钱业的典型，且长期执全国钱业之牛耳，故历来为学者所瞩目，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就注意其动向，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本书仍然以较大的篇幅叙述江浙一带和上海的钱庄。不过，书中也根据资料的可能，注意介绍北京、天津、汉口、兰州、四川、湖南、福建、广州等地的钱庄，以求本书的视野能较前此的论著开阔和全面一些，庶乎使本书题名为“钱庄史”更名副其实一点。

由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徐学先生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的辗转介绍，1995年冬，上海文艺出版社约我为《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第二辑撰写《钱庄史》一书。这也是一种机缘吧。我虽然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十余年了，但对于钱庄史并不熟悉，因此先有点踌躇。及至对钱庄史的研究状况作了学术史的回顾，并查阅了基本史料，认为这是一个有新意的选题，我便决定接受约稿。历时半载，今天

终于脱稿。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给了这样一个专题研究的机会,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加深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少认识,对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必大有裨益。

为本人的学识和掌握的资料所限,书中必有疏误,盼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日后改正。

陈明光

1996年6月25日

于厦门大学北村寓所

目 录

前言	1
一 钱庄兴起的历史考察	1
(一) 悠远的序曲	3
1 从“柜坊”到“收票”:钱庄存款功能溯源	5
2 从“飞钱”到“会票”:钱庄异地汇兑业务的一脉相承	11
3 从“交引铺”到“钱店”:钱庄货币兑换业务的由来	15
4 “借鸡下蛋”:钱庄放款资金来源的历史启示	19
5 商业信用与信用贷款:钱庄信用放款的社会习俗依据	21
(二) 明末清初钱庄的兴起	24
(三) 近代中外贸易的发展与钱庄的演变	28
二 钱庄的组织形式与人事关系	31
1 钱庄组织类别的划分	31
2 合伙制钱庄的组织程序与人事关系	39
3 用人观念与方式	63
4 钱庄的同业组织	75
三 钱庄的票据与帐簿	92
(一) 票据举要	92
1 钱票和银票	93
2 庄票	99

3	定期存票	103
4	汇票	104
5	支票	109
6	上票	111
(二)	会计帐簿制度	111
1	“三帐”体系	112
2	清帐房的几种重要帐簿	115
3	新式会计帐簿的采用	119
4	钱庄的帐务文化	121
四	钱庄的经营要术及其特色	123
1	“克存信义”——钱庄立业的基本原则	124
2	“一诺千金”——钱庄放款经营术特色	138
3	“头发丝吊元宝”——钱庄薄利多收的经营原则	146
4	拆票与银拆——钱庄放款资金的来源与经营术的变化	155
5	“服务买卖”——钱庄方便客户的工作方式	161
6	过帐、轧公单、拨码——先进的票据清算制度	164
7	投机性经营术	172
五	钱庄与金融风潮	177
1	人欠·欠人——上海倒帐风潮	178
2	上海贴票风潮	182
3	上海橡胶股票风潮	183
4	“信交”风潮	189
5	白银风潮	192
六	钱庄与政治风云	196
1	钱庄与国内政局动荡	196
2	外敌入侵与钱庄	200

3 钱庄与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	207
4 历史的结局	214
主要参考书目	216

一 钱庄兴起的历史考察

“钱庄”是个历史名词,但来历并不古老,它作为一个表示金融机构的名词,首见于官方文献大概是在清代乾隆初年。《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在乾隆十年(1745)正月记载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但铺户奸良不一,应飭各州县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干,造册。”^①

“钱庄”既以“钱”为名,顾名思义是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又称钱业。不过,自清初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官府和百姓对“钱庄”一词的确切内涵并未有定说。上引周学健之奏建议把“钱铺”与“钱庄”分别登记在册,可见两者应是有所不同的,然而区别之处究竟在哪里,他没有明说,

①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第七章说明代万历年间的书中已提到钱庄,依据的是《隔影帘花》第三十六回:“第一季(李)来旺一向得了南宫吉的本钱,在河下开了酒饭店,又卖青布,开钱庄,极是方便,吃得黑胖。”但是据考证,《隔影帘花》不是明人作品,而是根据清人丁耀亢的《续金瓶梅》改写的。参见叶世昌:《从钱铺到钱庄的产生》,载《学术月刊》1990年第5期。

另据介绍,明人所绘反映南京繁华景象的《南都繁会图卷》中,在一百多个招牌、幌子内,就有“钱庄”一种(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14页)。惜未能见到原图。这应是目前在文物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钱庄”词语。

我们也无从考查。从字义上说,“铺”有“贾肆”即商店之义,是罗列货物以供出售的地方;“庄”有庄园、田舍之义,是有田园和房舍之处。^① 庄的规模应该比铺来得大。不过,如果因此就说“钱庄”的规模一定比“钱铺”大,却未必正确。事实上,从清代的官私文献上来看,被称为钱庄者种类不少,但它们在资本规模大小、经营业务多少、在同行业中的地位等方面是颇有区别的。规模最小、档次最低的钱庄店面不大,只经营银钱的零星兑换一种业务,如以银元换铜元,以铜元换角洋之类,因是以现币兑换现币,所以又称现兑钱庄、零兑钱庄。在上海,这类钱庄多开设于热闹街区,与普通门市商店相似,因此又有“门市钱庄”之称。又因它们同时兼卖烟纸之类的杂货,俗称烟纸钱庄。在扬州,这种兑换庄被当地人叫做小钱庄。经营业务较完备、资本较雄厚的钱庄则集存款、放款、异地汇划、货币兑换、发行庄票等业务于一身。这类钱庄在上海被称为汇划钱庄,在扬州被叫做大钱庄。但是,所谓汇划钱庄与零兑钱庄、大钱庄与小钱庄之分都是口头俗称,它们自己的招牌写的都是“××庄”,并无区分的标识。可见若要对周学健奏疏中的“钱铺”和“钱庄”下定义,因无明证,并非易事。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学术界研究钱庄者才试图给“钱庄”一词下定义。例如 1931 年出版的施伯珩著《钱庄学》一书开篇给“钱庄”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钱庄者,有无限公司之性质,以独资或合伙组织,均依自己之信用,吸收社会一方之资金而贷诸他方,以调剂金融界之需要与供给,及以货币为交易

① 参见《康熙字典》。

之企业也。”^①这实际上是以上海汇划钱庄或扬州大钱庄为定义对象的。的确,只有此类钱庄才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对社会的经济和习俗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所以本书行文中所说的“钱庄”在多数场合就是指这种钱庄。^②下面探讨钱庄的兴起原因时亦以之为对象。

(一) 悠远的序曲

从行业的总体性来看,钱庄有两个特征:一是金融功能多样化,即经营存款、放款、异地汇划、发行钱票以及货币兑换等多项业务;二是以工商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根据这两个特征的形成时间,再加上“钱庄”一词始见于清初,所以在有的人笔下,钱庄的历史便是发端于清代初期。

例如,上引施氏的《钱庄学》论钱庄之起源时认为“其发轫之初,不外下列诸说”:一是起于甬商所创之借贷,二是起于殷商富户之外库,三是起于山西票庄,四是起于现兑店。而这四种说法无一不是以清代某地为时间和空间的起点的。例如,他在书中第四编记述宁波钱庄的沿革时说,清朝同治年间,“是时宁波有方七者,鬻靴于上海五康庄之前,每日除衣食外颇有盈余,而其所余之金钱,悉数存入于五康庄,以求子息,日积月累,已达百吊。不数年,沪地难起,一般豪富均相率迁避,络绎不绝,而五康之主人亦宣告他去,因素感方七之忠实,临

① 上海商业珠算学社 1931 年 9 月版,第 2 页。

② 长江一带名为钱庄的,在北方各省及广州、香港多叫做银号,本书引用资料中凡钱庄、银号实为一类者,在行文中皆不另加注明,径加引用。

去时赠以店内一切什物,并嘱其继营斯业。于是方七罢靴鞋业,将平时所储蓄于五康之百金,转为现兑业。是即现今宁波经营钱业者之鼻祖也。”显然,这些说法都囿于一时一地的传闻,充其量只能说明某一地的钱庄是如何创设的,而不是把钱庄当作一种行业并作了上下求索的历史考察之后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孕育和诞生的过程。所以,近代以来有关钱庄的论著多数并不因为“钱庄”一词未见于明代文献,就断定钱庄起源于清初,而是试图从钱庄的金融业务入手去追根溯源,但终因文献缺乏明载且着眼点又有所不同而莫衷一是。例如,1931年12月上海华通书局出版潘子豪编写的《中国钱庄概要》一书,作者在第二章“钱庄之起源及沿革”中指出:“中国有数千年之历史,钱商之起源必甚早,无可疑义。惟欲究其确实之起源及其年代,在史乘上无明显记载,迄今尚无定说。”接着他划分“兑换时期”、“保管时期”、“贷借时期”和“汇兑时期”,试图概述“钱庄事业之进化”,然而行文笼而统之,语焉不详,使读者对钱庄起源问题仍如堕五里雾中。不过,他从钱庄的金融业务入手而上溯渊源的思路显然比施氏《钱庄学》来得开阔,方向是正确的。嗣后论者一般多强调明代中叶以来日益兴旺的经营货币兑换的钱桌、钱店是钱庄的前身;有些人则主张唐朝代人保管钱财的柜坊是钱庄的雏形;有的则认为明末清初经营汇款业务的商号或民信局是钱庄的滥觞。

我们认为,钱庄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它的应运而生和专业化、行业化乃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长期发展、共同孕育的结果,其金融功能和服务特色也是受历史上金融活